

周恩来的外交理念与 21 世纪先进文化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周恩来的外交理念可以用“和”、“合”、“共”三个字来概括;“和合”是其核心和灵魂,和平合作,共同发展是其主要内容。在新世纪,人们将发现,合作竞争、双赢战略将是最好的选择;“和而不同”、“共存共荣”、“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补相成”,将是 21 世纪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周恩来外交理念的概括和合乎逻辑的丰富和发展。周恩来的外交理念——关于和平合作,和而不同,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和合”精神,必将是 21 世纪人类能够建立起来的共同的价值观的精髓。

关键词:周恩来;外交理念;和合精神;先进文化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3)01-0019-06

一、周恩来的外交理念

周恩来的外交理念,大体上可以用“和”、“合”、“共”三个字来概括:

其一是“和”,就是“贵和”、“和为贵”。这里的“和”,就是和气、和睦、和平、和解、友爱、团结、协同。“和”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爱人,爱别人,爱人民,爱天下人。为人民服务既是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同时也是周恩来外交理念的逻辑起点。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中和者。这里的“中和”就是从中和解,从中协调,实现和平。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周恩来在“文革”中起重要的“中和”作用一样,周恩来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中和作用,为党的团结、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他所处的世纪,为构建国际均势,促进世界和平,也发挥了巨大的中和作用。周恩来不仅有为人民、为革命,为了合作共事,有他素性温和这—个性特征的一面;也有以“和为贵”作为组织思想和策略思想的一面;还有与之相适应的求大同、存小异、异中求

同思想方法的一面。周恩来是一位在意见纷呈、各执一端中发现共同点,把大家的意见“和”起来,最终形成对革命事业最好方案的能手。他在建国初就指出:“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异是允许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1]。所以韩素音赞誉周恩来:“他不仅是一位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统一战线的艺术家,是一位调和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天才。”^[2]

作为伟大的中和者,周恩来的重大作用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西安事变、重庆谈判、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等重大事件或重大的国务活动中。在这些活动中,周恩来充分体现了颜师古注《中庸》所说的“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的精神,把“中和”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灵活、机动,游刃于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了许多震惊中外的和谈、和解、和平、合作重大成果。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充满智慧的政治

收稿日期:2002-11-03

作者简介:汪浩(1942),男,江苏涟水人,淮阴师范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高等教育研究。

艺术大师。

有些同志就周恩来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中和”的失误,便认定周恩来是容易妥协的调和主义者,这是一种误解。一个调和主义者,政治上首先是改良主义者,这与周恩来风马牛不相及。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不妥协,无论环境如何复杂,工作如何艰苦,他都一以贯之。梁衡先生所总结周恩来的“大无”、“大有”精神,正是周恩来革命坚定性最高层次的表现。遵义会议期间,他义无反顾地推举当时在党内地位及影响都不及他的毛泽东,同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文革”期间,他坚持推举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这些都说明他服从真理,坚持真理,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与坚定性。1944年,在国共谈判中,蒋介石断然拒绝我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协定草案”,并妄称“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退让:“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中国共产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3]。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周恩来的坚强与凌厉。当年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回忆说:“有人说周易于妥协是不公道的。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有原则性的人。”^[3]

其二是“合”,就是“合作”,汇合、融合、整合、和合、协力同心、九九归一。“和”是“合”的基础,“合”是“和”追求的目标,“和合”为了共事。共事也不是目的,目的是爱人、爱天下,爱人民。为了彻底实现“爱人”的理想,不仅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且还要尽最大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周恩来的“贵和”最重要的表现和最大优势就在于“合作”,在于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一道工作。周恩来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团结大多数这一宗旨和策略思想的最早觉悟者和模范执行者。毛泽东曾盛赞周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保持着最广泛的联系,善于与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合作共事。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其中最关键的是团结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自己的人。这就需要“宰相肚里能撑船”那样的度量,需要宽容,需要任劳任怨,

甚至忍辱负重。周恩来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

“和合”是周恩来外交理念的核心和灵魂。“和合”为了共事,而共事需要先共人——相互由不知到知、到信、到默契、到同心同德,追求和合的最高境界——和谐。而共人尤以和为先,在互爱互重中以先爱对方,先尊重对方为关键。这种先爱、先尊重,主要体现在谦让,吃亏与忍辱上。周恩来曾经说过,吃亏是一种进步。待人宽且约,责己周且严;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爱不求回报,尊重不讲条件,热情、积极、真诚、无私。只有这种真、诚、信为前提的诚信之情,才能产生人格的感召力。周恩来正是以他那超乎寻常的坦诚、博大的胸怀,赢得了广泛的信赖,使他在“和合”共事方面,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和谐。周恩来是我们党的领袖人物中最具人格魅力的伟大人物,这除了他始终清醒、英明之外,还与他的“贵和”、重情、诚以待人、乐于助人、乐于与人共事、乐于与天下平等待我之国家、民族、友人共事,在他的处世哲学中,充满诚信与智慧,全然没有权术与诡计,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三是“共”,就是共荣、共存、共同发展。“和”、“合”为了“共”,和平合作,为了共荣、共存、共同发展。共荣、共存,要有容人之量,要有“存异”之量。宋太祖那种床前不容他人酣睡的态度,就谈不上共存与合作了。周恩来不仅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有容人之量,而且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上也坚持平等、坦诚与宽容,主张国家民族之间合作交流、和平共处。他深刻地阐明了和平共处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类繁荣、经济发展。周恩来关于锡兰先后两件事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他宽容、异中求同、“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和合”精神。20世纪50年代初,锡兰(伊斯拉卡)遭遇大的自然灾害,请求中国援助。当时中锡尚未建交,而且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困难时期,但周恩来当机立断,与锡兰建立了优惠的贸易关系,不久,中锡建交。但后来在万隆会议快要结束的会议上,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发难,说了一番反对共产主义和所谓中国威胁的话。当时中国代表团已经赢得了会议的大多数,完全具备反击的条件,与会代表也满以为第二天会有一场唇枪舌战。可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第一个上台,声明他昨天的发言只代表个人,意外地退却了。原来是周恩

来在科发言后,出人意料地采取了典型的“周恩来方式”——以平等和兄弟般的坦诚,找科私下交换意见。“你这样的发言,我们一定要回答”,“争论下去,结果是必然达不成任何协议。你是发起国,你把我们请来,你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周恩来的坦诚和大义凛然,感召了科氏,因而作出了那样的声明。由于周恩来的坦诚和大量,中锡两国巩固和发展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是以这样的坦诚,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

二、周恩来外交理念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建国初,周恩来就提出了“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友好合作”、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竞赛”的新观念,并已经洞悉了“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1]。1973年6月周恩来会见戴维·洛克菲勒时提出,必须寻找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合适方法,并指出像中美联合公报那种求同存异的方法是可取的。与周恩来同时代的外交家、政治家,当时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周恩来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关于“和平”、“合作”、“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这一外交理念的重大意义,现在,当新经济与全球化成为社会潮流,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谋求区域性、国际间各种形式的平等互利、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周恩来的这种预见性、深刻性、超前性所折服,为他的高瞻远瞩而惊叹!

共荣、共存、共同发展,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实践以和平共处为中心内容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建立国际力量均势的意识,在酝酿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最初阶段,已经开始形成新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国际力量均势关系上,力量平衡上,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多边关系上。他把“友好合作”与“持久和平”联系起来,作为中国外交追求的基本目标。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新中国作为世界安全新的稳定因素融进了国际大家庭。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增强了世界局势中的稳定因素。在这世界格局转换的过程中,周恩来是“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

衡”的“关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4]。周恩来逝世不久,尼克松来华时对邓颖超说,没有必要为周恩来建立纪念碑,“因为历史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作是他的伟大的明证”^[4]。

早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的酝酿。毛泽东曾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你当总统,我是投了一票的。作为既是决策人又是执行者的周恩来,其纵观风云、运筹帷幄的重大功绩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对手的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也不失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上台不久,就发表他关于世界局势变化的新观点,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外,还有西欧、日本和中国。“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尼克松在《六次危机》的文章中以及他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的这些内容,并多次引用以分析世界形势。其后,在中美、中日联合公报中,创造性地写进了由周恩来所构想的“反霸条款”——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或其它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同时还宣布,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它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从此诞生了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标志着二战后集团政治对抗式外交向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期和平合作外交模式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这种战略的超前性在于不仅把和平共处看成是国际关系的准则,而且还把它看成是国际安全的准则。为此,周恩来提出了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进行贸易,技术上相互学习的主张^[5]。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通过求同存异的独特方式,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6]。

邓小平同志最早揭示了周恩来关于和平合作、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重大意义。他深刻地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都解决不了问题;和平共处……适用于全世界,它能够为社会不同制度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处理相互关系服务,是最经得住考验的。”邓小平据此提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还在周恩来关于和平、合作、共同发展这些理念的基

基础上,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为构建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新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

跨入 21 世纪,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严峻的挑战,“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靠各国合作应对”^[7]。“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应该抛弃那种非结盟就是对抗的旧思维,确立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安全观”^[8]。“各国应加强经济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共存的目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9]。这些思想都是对周恩来外交理念的发扬和光大。

三、周恩来的外交理念对未来的影响

周恩来的外交理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和合”精神——周恩来外交理念中的核心和灵魂,它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哲学。《道德经》说“和曰常”,“和”是客观规律。正是在这种“和合”哲学、“和合”理念的熏陶下,我国古代就孕育了关于一切公共关系——人与人、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甚至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可以说是儒家提出的关于公共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的准则;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孔子讲“和而不同”,可以说是和平共处理论的最早源头;有人把“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说成是世界外交起源于中国商初的明证;至于《周易》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是说世界的发展变化,万事万物各得其位,保持合作与和谐,就能顺利发展,这简直就是现代“共生说”——由生物共生到人类共生、万事万物共生——的基本观点。《周易》可以说是从哲学高度探讨人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其中也包括外交理念的最早典籍。

考察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特别是他的外交理念,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周恩来把最基本的做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放大、延伸成为社交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准则。因此,周恩来的外交理念,充满了人情味和道德的潜在力量;周恩来的外交实践,最打动人,也是最宝贵的外交遗产,不是他的外交技巧,而是他的外交伦理。第二,周恩来的外交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正如迪克·威尔逊指出的那样,不仅仅如此,还同周恩来实际经历有关,同时也吸纳了人类先进文化,并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使之得以升华;因此周恩来的外交理念,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且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第三,周恩来的外交理念,不仅具有传承性,同时更具有创新性,这在周恩来主张的“诚信外交”,“民间外交”,特别是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方面的基本理念,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从这方面说,周恩来的外交理念,植根于遥远的历史,还将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因为它反映了国际关系最基本的规律和理念,具有强大的历史贯穿力和穿透力,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世纪之交,世界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莱斯特·罗瑟);“当今世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孤立、自足的经济体系,现在必须承认,我们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10]。社会信息化、产业知识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罗兰·罗伯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第 51 届会议公报提出,世界正经历着以知识为基础的三大变革,而“协作是当代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11]。东南亚金融危机和“9·11”事件,使全球政治家、经济理论家、发展战略家越来越形成共识:大国包揽国际事务的时代不复存在了。依靠少数大国维护国际安全的幻想也被打破。正如加拿大外长和挪威外交大臣联合撰文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一个国家可以靠自身力量单独完成。”他们呼吁“建立一种合乎人道主义的国际秩序”^[12]。而韩国总统金大中说得更为明白:“最近世界文明出现的巨大变革要求人

类更加迅速地朝着全球主义的目标迈进,把地球看作一个大家庭”;“简言之,是确立将作为全球主义的支柱的共同价值观的时候了”;“自由、人权、正义、和平和效益就是人类根据全球主义的原则应当接受的共同的价值观”^[13]。这些意见,无疑给我们以启迪,结合前文所引江泽民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鲜见解,我们可以大致描述 21 世纪先进文化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大致可见的基本框架。

其一,把地球看作一个大家庭,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園,需要共同维护。其二,信息化、全球化使时空压缩,使人们的整体意识增强。偌大的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在地球村里,人、组织、民族、国家,甚至包括人类与自然界,相互间不但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和谐共生的利益高于一切。其三,共存、共荣、共同发展,是最好的战略选择,和而不同,多边化、多样化是必须认同的基本现实。

金大中的“全球主义”当然不能等同共产主义,但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追求,反映了一种积极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愿望。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理想、信仰上有不同,可以不必强求统一,但关于 21 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应可以达成如下共识:政治上,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异中共同发展,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共存共荣;经济上,按共同商定的“游戏规则”办事,公平竞争、合作共处、互利互惠、共赢共存、共同发展;文化上,各种文明互相尊重,合作交流,互相学习和借鉴,取长补短,既要国际化,又要民族化、地方化,丰富多彩,普遍繁荣。这种多边化、多样化、和平合作、共存共荣、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世界新秩序,正是“桃花源”、“大同书”、“乌托邦”、“太阳城”人类理想社会这一古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 21 世纪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种发展方向所透露出来的哲学和文化的深刻理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原理,融汇并升华了量子力学的互补性原理,系统论的自组织和整合原理,现代经济发展学说关于和谐创新、可持续发展原理,以及东方古典人文精神——中国人的天一合一、和而不同、和合生生的和合哲学。这种现代大文化理念的根据是“信息社会不是被强力控制下抹杀个性的有序社会,也不是混沌无序抵消个性的社会,而是

通过信息的作用,每个行为主体不断自组织来实现整体优化的多样化的社会”、“合作竞争和双赢战略,将是最好的选择,企业目标必须向社会目标靠拢。因此,网络协同的作用日益成为继市场规律、政府干预之后的第三只手”^[14]。这就是 21 世纪人类必须面对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客观规律。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金大中呼唤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自由、人权、正义、和平和效益”,如果这一构思能够成立,一定还有一个合理的内核: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竞争,共荣共存。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和平共处,“自由、人权、正义”是不能成立的,没有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竞争、共荣共存,“和平和效益”也是不能成立的。江泽民同志 2002 年在美访问时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补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直谛”^[15]。在这里江泽民不仅揭示了“和而不同”是世界万事万物,包括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概括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坚持的最基本的外交理念,而且还阐明了“和而不同”、“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和平合作、共同发展应作为 21 世纪世界共同遵循的价值观。

总之,时代在呼唤和平发展,时代在呼唤合作共处,时代在呼唤协作竞争,时代在呼唤和合精神——和平合作,和而不同,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当我们在世纪之交展望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禁不住惊诧地发现,时代在呼唤周恩来!这不仅由于他首倡的和平共处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不仅由于这一伟大理论付诸实践,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新突破,揭开了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的时代序幕,而且还由于他的外交理念——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和合”精神,必将成为 21 世纪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次上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如果说,人类能够在新世纪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的话,那么这一价值观的精髓一定是“和合”精神,到那时,人们将有两大惊人的发现:其一,中国

将偕同以“和合”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东方文化走向世界;其二,数百年西方文化东进的事实将发生重大变化;不仅有西方文化的东进,而且还将有东方文化的西进。由此,21世纪的世界文化,才真正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正态交流。这可能就是杨振宁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在21世纪将大放光彩”^[16]。◁

参考文献:

- [1]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9.
- [2] [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75.
- [3] 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710;664.
- [4] [美]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271;284.
- [5] 谢益显.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78.
- [6]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25.
- [7] 江泽民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N].新华日报,2002-4-11.
- [8] 访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N].光明日报,2002-2-23.
- [9]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0] 傅维利,杨民.学会合作——21世纪世界教育的重要目标[N].中国教育报,1997-12-13.
- [11] 利源.世界企业正经历三大变革[N].新华日报,1998-1-4.
- [12] 建立一种合乎人道主义的国际秩序[N].参考消息,1998-10-24.
- [13] 世界迅速向全球主义目标迈进[N].参考消息,1998-11-23.
- [14] 杨培芳.社会协同,信息时代的第三种力量[N].光明日报,1999-10-22.
- [15] 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N].光明日报,2002-10-25.
- [16] 杨振宁.乐观预言见证今天[N].参考消息,2002-10-29.

Zhou Enlai's Diplomatic Concepts and Advanced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WANG Hao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Huaian 223001, China)

Abstract: Zhou Enlai's diplomatic concepts can be generalized by three words, i. e. peace,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Peace" and "cooperation" are the core and soul. Peaceful cooperation and co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content. In the new century, it will be found that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and win win strategy are the best choice. "Peace with difference", "coexistence and mutual prosperity" and "with honesty as the essence, peace as the precious, and honor as the first thing" are in harmony without being stereotyped and are different without mutual conflict. "Harmony for coexistence and mutu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omplements with differences" will be the most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shared by people in the 21st century. Zhou Enlai's diplomatic concepts -- the "peace and cooperation" spirit about peaceful cooperation, peace with difference, coexistence and mutual prosperity, mutual development -- will be the essence of common value views that can be established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Zhou Enlai; diplomatic concepts; "Peace" and "cooperation" spirit; advanced culture

责任编辑:张超